

# 中韩日青铜珍品齐聚国博

人民日报记者 邹雅婷

中国春秋时期的青铜鼎、方壶、编钟，代表韩国青铜文化的剑、细纹镜、钟，日本出土的青铜铎、矛、剑、镜……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创建110周年之际，由中国国家博物馆、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联合举办的“东方古金——中韩日古代青铜器展”亮相国博。

展览分为“中国古代青铜文化”“韩国古代青铜文化”“日本古代青铜文化”三个单元，汇聚中韩日三国国家博物馆珍藏的青铜器精品约50件(组)，充分展现了三国各具特色的文化传统与科技、艺术成就，反映了三国之间源远流长、广泛密切的交流与互鉴。

中国青铜礼乐文明奠定了早期中华文明的基础，也对世界其他地区的青铜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世界古代文明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安徽寿县蔡侯墓是中国考古重大发现之一，作为春秋晚期非常重要的诸侯国君主墓葬，蔡侯墓中出土青铜器486件，器型丰富，品类繁多，其中不乏制作工艺精湛、艺术水平高超的美器，也有铸刻长篇铭文、史料价值极高的重器。

“中国古代青铜文化”单元展示了寿县蔡侯墓出土的几组代表性青铜器，包括鼎、簋、尊、鉴、缶、方壶、编钟等，阐释了先秦时代礼乐文明的深厚内涵。

此次展出的蔡侯青铜鼎，是蔡昭侯墓出土铜鼎中体量最大的一件，此种样式的鼎在该墓中仅发现一件。据专家介绍，这种形制硕大的鼎被称为“鬲”，常用来烹煮食物或牺牲。这件鼎的底部有明显的烟熏痕迹，可见确曾用作烹煮器具。

造型精美的蔡侯青铜方壶吸引了记者的目光。壶盖顶部镂空莲瓣形，颈部有蟠螭纹，两耳为兽形，以四伏兽作足，姿态生动。壶颈内侧有铭文“蔡侯申之壶”。青铜壶是历史上使用时间较长的酒器类型，从商代沿用至汉代甚至更晚。这件方壶体量较大，气势恢宏，其腹部所饰田字格纹及颈部略呈梯形的连续纹带，均是流行于西周晚期青铜壶上的装饰元素。

“韩国古代青铜文化”单元呈现了韩国青铜文化的诞生和发展演进轨迹。韩国的青铜文化始于公元前15世纪左右，在公元前4世纪左右达到顶峰。青铜剑、多钮铜镜、各式各样的青铜铃是韩国青铜时代的代表性器物。公元前3世纪中叶，随着新的铁器文化传入，韩国的青铜时代逐渐走向衰落。在佛教信仰广为流行的高丽时代，香炉、净瓶和烛台等各种供养用具多以青铜制造，匠人们还将银入丝技术应用于青铜工艺品中。这一单元的重点展品

包括青铜时代的多钮细纹镜、原三国时代的漆鞘青铜剑、迄今发现最早的高丽时代梵钟、高丽时代最大的青铜悬香炉、保存完好且年代最早的朝鲜时代青铜银入丝香炉等。清州思德寺出土的青铜悬香炉，造型非常优美，这种悬香炉在同时期其他国家尚未发现，是高丽具有独创性的香炉，在弥陀会等场合中与香塔、光明台一起使用。

“日本古代青铜文化”单元重点展示日本古代青铜文化的发展轨迹及其与中国、朝鲜半岛青铜文化的交流，重点展品有青铜铎、宽型青铜矛、鼈龙镜、附铃青铜铎等。在日本列岛，以青铜器为代表的金属器的使用始于弥生时代。这一时期，铜、锡、铅等青铜铸造原料来源于朝鲜半岛和中国。从公元4世纪左右开始，在日本本土仿制的中式纹样铜镜逐渐成为古坟中引人注目的随葬品。此次展出的一块古坟时代鼈龙镜，是参照中国环状乳丁神兽镜的纹样



↑日本古坟时代鼈龙镜 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 摄

制成。中式铜镜用于分割内外区域的环形里，常刻有吉祥词句，此镜却改为用半圆方格带状纹饰填充。既借鉴吸收中国文化元素，又有自己的独特设计，是这一时期日本铜镜的一大特征。

据悉，此次展览将持续到10月9日。展览期间将通过国家博物馆融媒体矩阵，多渠道持续推送“云看展”内容。

## 超半数受访俄罗斯人想创业

据参考消息网报道 据俄罗斯卫星社5日报道，一项研究结果显示，57%受访的俄罗斯人想创业，尤其是年轻人和小规模居民点的居民。

据报道，研究结果称：“调查期间发现，绝大多数俄罗斯人(57%)想创业，35%的受访者对此持相反态度。”此项调查于7月27日至28日进行，1000名俄罗斯人参加，其中450位男性，550位女性。

报道还指出，大多数人(55%)无法创业是因为没有启动资金，大约三分之一(28%-30%)人苦于找不到商业模式和商业计划，29%的人不知道从何处下手。

## 朝鲜宣告「首轮疫情结束」

据朝中社报道 朝鲜官方数据显示，该国最近一周无新增发热病例，且所有发热病例均已痊愈，标志着朝鲜“首轮疫情浪潮已结束”。分析人士担忧，鉴于朝鲜在经济、粮食供给、医疗设施等方面仍面临挑战，还需谨慎对待疫情反弹的风险。

根据朝鲜国家紧急防疫司令部通报的数据，朝鲜最近一周无新增发热病例。目前，朝鲜累计确诊发热病例约477万人，累计死亡74人，所有发热病例均已痊愈。

朝中社称，尽管防疫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各部队各单位仍应“加倍努力保持国家防疫政策的完美落实”。

朝中社指出，应加强对新冠变异毒株和各种疾病的预防活动，正确透视各地区疫情发展特点及集体免疫水平，并有远见地采取合理的对策方案，以迅速调派中央和地方的医务工作者有效应对突发性危机；还要全面启动急救医疗服务体系、远程医疗服务体系等机制，努力巩固防疫成果。

## 日本上半年经常项目顺差大幅下跌

据新华社电(记者 刘春燕)日本财务省8日公布的国际收支初步统计报告显示，由于原油等进口商品价格上涨叠加日元大幅贬值令日本贸易收支恶化，上半年日本经常项目顺差大幅下跌，为2014年以来同期最低水平。

数据显示，上半年日本经常项目

顺差额为3.5057万亿日元(1美元约合135日元)，同比减少6.0021万亿日元。

其中，货物贸易方面，贸易收支由去年同期的顺差转为逆差，逆差额5.6688万亿日元；服务贸易方面，贸易逆差继续扩大，达到2.4947万亿日元。这使整体贸易收支由去年同期的顺差转为逆差，逆差额8.1634万亿

日元。上半年，受益于日元贬值等影响，日本海外投资收益同比增加2.3563万亿日元至12.8728万亿日元。

报告显示，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双双呈现逆差情况下，海外投资收益保持增长是日本能够维持经常项目顺差的主要原因。



↑8月9日，车辆在韩国首尔的沿江公路上行驶，旁边是受强降雨影响而水位上涨的汉江。据韩国气象厅9日消息，从8日6时至9日8时，首尔铜雀区新大方洞累计降水量达到422毫米，这一数字超过首尔地区往年8月份348.2毫米的月平均总降水量。受强降雨影响，首都圈地区多处道路被淹，公共设施受损，部分地铁线路停运。 新华社记者 王益亮 摄

## 日本“最古老”中餐厅倒闭

据参考消息网电 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近日报道，日本横滨中华街的老字号高档中华料理店“聘珍楼横滨总店”的运营公司“聘珍楼”(横滨市中区)最近因经营不善被迫破产。聘珍楼横滨总店创立于1884年，被称为日本最古老的中华料理店，也是横滨中华街的标志。

除遭遇新冠疫情外，肩负着横滨中华街重任的人也出现新老交替。白天，这里变成了年轻人的街市，虽然到访的人数增加，但客单价增长乏力。一直以“正宗中餐”为卖点的中华街，正在发生异常变化。

聘珍楼横滨总店套餐人均1万至2万日元(约合人民币500至1000元)，以高档中餐赢得了人气。在泡沫经济时期的1986年，建成了7层楼的门店。聘珍楼抓住了企业的宴席和

接待需求，据称过去的运营公司在鼎盛时期实现了超过100亿日元的年销售额。

但是，开始多店经营之后，收益情况出现恶化。由于经济不景气，企业法人的利用率逐渐下降，2017年决定启动特别清算，总店的运营由另一法人聘珍楼(横滨市港北区)接手。

2018年公司被拆分，新设的法人聘珍楼(横滨市中区)开始经营这家横滨总店。其他店则由位于横滨市港北区的聘珍楼经营至今。

熟悉世界各地唐人街的日本筑波大学名誉教授山下清海指出，“对于横滨中华街来说，聘珍楼横滨总店的关闭具有象征意义”。他表示，“担负着中华街重任的人出现了新老交替，由战前或战后不久来日本的‘老华侨’，变成了改革开放以后来到日本的积极

进取的‘新华侨’。中华街的形象和品牌也发生变化”。

报道说，同学会和企业等喜欢团体订购高单价的套餐，“正宗的中国菜”能够让他们满意。这种品牌影响力过去曾是中华街的优势。但泡沫经济期以后，企业的使用率逐渐下降。中华街上的自助餐厅增多，价格竞争激烈。宣传低价的招牌在街上十分显眼，可以边逛边吃的外带店增多。

横滨中华街上有500多家店，号称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唐人街。在疫情前每年有2000万人到访。目前人流也在恢复。

报道称，疫情后改变的生活方式能否恢复不得而知。山下清海认为，“已不能依赖法人和团体吃中式套餐的传统方式”。要获得新粉丝，吸引回头客。

中国和韩国建交30周年之际，第二届中韩科技创新企业家论坛暨第五期“亮马丝路”国际讲堂4日在北京举行，两国信息通信技术领域专家和企业代表围绕信息通信技术创新与合作主题展开交流讨论。

专家指出，中韩两国近年来在信息通信领域开展的一系列科技创新交流活动，进一步增强了双方友好合作的信心。面对新机遇新挑战，两国相关机构将持续搭建互利共赢平台，服务科技创新合作成果转化，不断推动两国合作迈上新台阶。

### 深化合作

长期以来，中韩两国在科学技术、信息通信等领域保持良好合作，在联合研发、产业创新、人文交流等领域取得丰硕成果，为双边关系和两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作为此次论坛的中方主办单位，中国国际青年交流中心主任张华表示，科技创新发展离不开国际间的携手合作，中韩两国自1992年签订科学技术合作协定以来，在科技与创新发展方面取得丰硕成果，两国在信息通信技术创新合作方面具有较强韧性和较大潜力。

在与中国加强信息通信产业合作问题上，韩国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卢京元认为，自1992年建交以来，韩中两国在科学技术和信息通信等诸多领域开展合作，取得互利共赢。希望今后两国创新企业和相关机构通过战略合作建立更多联系，创造更多交流平台。

### 聚焦创新

面向未来，围绕如何顺应产业发展要求，加速集成创新5G、人工智能、先进计算、信息网络等信息通信技术，更好、更快、更深度赋能行业数字化转型，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快速发展，中韩两国专家进行了探讨。

在谈到利用先进信息通信技术打造国际一流创新型空港时，参加论坛的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招商局局长王伦茂表示，为打造全球数字贸易的产业创新高地、数据治理高地、开放合作高地和政策突破高地，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将以创新引领周边发展，努力夯实5G、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基础性建设，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引导、培育创新型数字经济企业汇集，实现从贸易数字化到数字贸易化转型。

韩国现代汽车集团(中国)经营研究所所长金哲默认为，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和区块链等技术创新赋能产业升级，让汽车模拟测试、销量预测分析等流程的时间大幅减少，成本不断降低，从而推动生产效率不断提高。信息通信技术的持续创新让汽车制造业已经超越信息化进入数字化，并向智能化不断发展。

### 共迎挑战

近年来，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信息通信产业发展面临复杂严峻的环境变化。在此背景下，专家们就中韩两国如何共迎挑战，推动信息通信产业良性发展提出建议。

中国移动通信研究院首席科学家易芝玲认为，相对而言，信息通信技术不易受地域限制，容易共享且应该共享。目前，中韩两国企业在信息通信技术领域努力寻求合作的积极尝试，将成为双方共同应对各种挑战的核心力量。希望两国企业未来能够聚焦可持续性发展课题，让信息通信技术创新在人类可持续发展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

隶属于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的非营利机构在韩国创新中心(KIC中国)是本次论坛的韩方主办单位。该中心代表金钟文表示，尽管受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今年上半年韩中两国贸易依旧保持增长态势，韩国企业在中国的投资额持续增加。韩中经贸合作是互利共赢的典范，两国产业链供应链密不可分，希望双方未来能够持续深化在信息通信技术、环保、人工智能和新材料领域的合作。

## 日本上调最低工资标准

经济日报记者 陈益彬

8月1日，日本厚生劳动省中央最低工资审议会决定，将今年最低工资(时薪)平均上调31日元，达到961日元，上涨3.3%。

日本自民党干事长茂木敏充在8月2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对最低工资上涨表示欢迎，称今后将对人才和尖端技术的大胆投资，继续提高工资标准。厚生劳动大臣后藤茂之则表示：“希望企业能切实提高工资，我们将提供支援。”

日本最低工资标准每年夏天由工人代表、雇主代表以及具有中立立场的公益委员组成的审议会讨论提出。以此作为参考，各都道府县的审议会再决定具体金额，并从10月份左右开始实施。

今年受俄乌冲突、物价上涨、日元急剧贬值等因素影响，日本经济形势恶劣，给普通劳动者生活造成冲击，涨工资的呼声不断高涨。据日本媒体报道，在审议过程中，虽然劳资双方均认可提高工资的必要性，但是围绕工资上涨的具体幅度出现了意见分歧。对于劳方要求大幅上调工资的意见，资方以原材料价格上涨影响收益等为由，主张抑制工资涨幅。至7月25日，劳资双方代表和公益委员进行了4次协商，但均未达成共识。直到8月1日，经过7个小时的艰难谈判，各方才最终就涨幅标准达成一致。

分析认为，此次最低工资上涨实际效果有待检验，劳资双方均对这一结果表示不满。

一方面，此次最低工资上涨尚未达到解决实际问题的程度。日本经济界相关人士表示，虽然此次工资涨幅达到历史最高，但是如果剔除物价上涨部分，实际涨幅只有1%左右，对于解决劳动者生活困难杯水车薪。

此外，工资上涨仅对部分收入偏低的劳动者工资有拉升效果，但对于工资处于更高水平的群体而言则收效甚微。还有观点认为，仅提高最低工资标

## 日本上调最低工资标准

经济日报记者 陈益彬

准解决了日本“同工不同酬”的问题。在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的当下，大量企业通过雇佣非正式员工降低人工成本。在工厂同一条流水线上工作，正式员工工资可达非正式员工的2倍，这是造成日本最低工资水平低、贫富差距大的重要原因之一。如何促进企业整体效益提升，切实实现按劳分配是下一步政府面临的重要课题。

另一方面，最低工资上涨给企业造成负担。日本商工会议所会长三村明夫称，此次最低工资上涨“对企业来说非常困难”。他认为，这次提出的目标金额虽然考虑到了物价上涨对劳动者生活的影响，但并未充分考虑企业当前支付能力低下的现状。

分析认为，对于雇佣大量非正式员工的餐饮住宿企业来说，最低工资调整会造成总体成本大幅上涨，加之疫情形势严峻，企业经营状况不明朗，可能对其生存造成严重后果。

不仅如此，由于原材料价格高企，中小企业受成本提升影响更大，且存在难以推动成本充分传导至价格的情况。此时，若用工成本持续提升，将极大考验企业承压能力。如果企业放弃增加雇佣人数，或缩小业务规模甚至撤离，可能反而会带来失业和经济恶化的副作用。

企业界认为，日本政府不加大财政支出，仅靠政策要求强制企业提高工资水平是一种“政治提薪”的行为。经济同友会代表干事樱田谦悟对提高最低工资的计划表示赞成，但同时也指出，政府应拿出实际举措彻底改变企业生产率低下的现状，强化日本经济竞争力。有观点认为，日本政府在提高工资标准的同时，应当考虑企业的实际运行情况，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并对提高生产效率 and 推进生态转型的中小企业进行全面支援，为企业自发提升工资创造条件。